

梦醒了无路可走

——从《伤逝》看鲁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思考

洪永春*

<目次>

I.引言

II.鲁迅对“五四”妇女解放观的独特选择

III.《伤逝》对“五四”妇女解放观的独特观照

(1)《伤逝》的爱情模式

(2)《伤逝》的家庭模式

(3)《伤逝》中的一对男女青年

IV.结语

I.引言

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21日，后收在他的小说集《彷徨》里。鲁迅一生的著述甚多，但关于爱情题材的小说仅此一篇，迥异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创作。或许，这与鲁迅不幸的旧式婚有直接关联，未等爱情之花怒放，便急数地枯萎了，而他等来许广平迟到的爱时已步入不惑之年，爱的感觉中恐怕少了许多浪漫和憧憬的成份。其实，早在1919年写的他的《随想录四十》里，鲁迅借一少年的爱情诗道出了自己情感生活的苦闷，其中的一段议论甚是符合他的寂寞处境和无奈选择。“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¹⁾ ¹⁾

1) 中国 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 chishui1314@163.co 1) 《鲁迅全集〈随想录四十〉》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14页2) 《鲁迅全集〈随想录四十〉》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15页3)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 第55页

最后又在文中附上这样一句话：“旧账如何购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²⁾而鲁迅让下一代自由选择爱情和生活的见解在同年10月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再次阐述过。显然，鲁迅是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赞扬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但作为过来人的鲁迅更关心如何把这一思想和实践落实到实处，而不是从口号到口号和实践上的半途而废。鲁迅在1923年12月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提到：“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免不了堕落或回来。”³⁾鲁迅的思考是把易卜生的《娜拉走后怎样》作为其思考的逻辑起点，而且从最坏处打算可能会有如上两种结局。事隔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恰好，1925年的3月鲁迅的爱情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机，小说《伤逝》也便伴随着诞生了。

II. 鲁迅对“五四”妇女解放观的独特选择

纵观“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观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层面仍然是政治的，即主张男女平权与妇女参政。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继续，但却赋予了新的含义。辛亥革命时期，尽管已经有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但真正的西方妇女观并没有广泛普及，当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像秋瑾那样的自求解放的妇女，其主体思想还是反清和政治体制的变革。

经历过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民初知识分子，有着一一种对“革命”与“政体变革”大失所望的普遍心态。用鲁迅的话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什么都要从新做过”⁴⁾（《华盖集·忽然想到》）。在共和政体之下，知识分子们新一轮的抗争开始了，这就是以陈独秀《新青年》为号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层面的，它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以新文化为手段，以反对非人的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为目标，以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解放人、解放个性为其精神价值取向。

新文化运动也赋予了妇女解放以新的含义。概观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妇女政治解放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1) 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尊孔复古”逆流，反其道而行之，将妇女的政治解放定位于反对封建礼教奴役，争取政治人格独立。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而其中的“夫为妻纲”，则把妇女置于夫

权之下，剥夺了妇女的参政权。为此，陈独秀号召：“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⁵⁾ ²⁾ 在政治上，妇女的人格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在社会上确立妇女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二是要妇女建立自己的独立参政意识，不再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轻委他人。经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特别是反孔老英雄吴虞等人的努力，应该说，其社会政治效果最为显著。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来的知识妇女也日渐增多，她们不同于秋瑾时代的妇女，以参政为自我解放之首选，而是在更广泛、更切实际的层面，开始了自我拯救运动，包括挣脱旧式婚姻束缚、³⁾争取恋爱自由、谋求教育与职业的权利等等，政治舆论的转向，无疑为她们创造了一定的条件。⁴⁾

(2)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与普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妇女政治解放的新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妇女与劳工是社会最没有能力的、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问题，离了社会主义，“断不会解决的”。因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但“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所以，“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⁶⁾李大钊在他的几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概言之，“五四”时期的妇女政治解放理论，由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逆流而起，以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思想为过渡，至确立“社会主义”理想终。

2)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层面是经济的，即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如何自谋职业，如何拥有与男子一样的财产继承权等，这是这一时期妇女研究的新动向。 在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从政治上探索妇女解放之路的同时，另一些

2) 4) 《鲁迅全集〈华盖集·忽然想到〉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60页5) 《独秀文存》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第56页3)

4)

则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的经济问题，其中尤以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影响最广。辛亥革命后的复辟帝制与“尊孔复古”逆流，激发了陈独秀等人更高涨的政治热情，导出更先进的政治理想；但对鲁迅而言，则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上。“重新做过”即“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⁷⁾，在妇女问题上也是如此。

理想主义者们浪漫地将“娜拉”介绍给中国女界，现实的鲁迅则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而且毫不客气地指出，出走后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论断让人扫兴，却是中国的现实。翻开民国报刊，因争取独立或恋爱自由而出走的女性，少有完满结局的。她们不是以恋爱失败告终，就是以谋生无着而“堕落”或“回来”，回到封建大家族中去，过比以前还不如的日子，甚至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鲁迅告诫女孩子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方法。”⁸⁾（《娜拉走后怎样》）深知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也要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的鲁迅，要民国的年轻知识女性们作好“壕堑战”的准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⁹⁾（《两地书》）；在争取经济权上，则要她们发扬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¹⁰⁾（《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开导，早已超出要经济权以外了，但在要经济权这一点上，鲁迅的指令是简单、清晰而执著的。再次，“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探索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的，即如何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论的时代特色，也是其主要的历史功绩

人的解放是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为前提，又是以文化观念的更新为结果的，妇女解放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要的是个性的解放，是对自由意识的追求，这离中国妇女的现实相距甚远。如何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广大妇女自觉的行动，就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课题。⁵⁾

5)6) 陈独秀在广东女屈联合会上的演讲稿，192年《鲁迅全集〈两地

综观这一时期一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化上的大讨论，如伦理、道德、爱情、贞操、婚姻、家庭、育儿、独身、社交、教育等，就文化观念而言，概括起来无非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 针对封建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一元妇女观，提出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二元妇女观，进而养成妇女在追求自我解放观念上的自觉。⁶⁾西方的妇女运动是建立在“为人或为女的两重自觉”基础上的，它不仅仅要求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政治权、经济权和教育权，更重要的是它要为女性特有的思维、心理、价值观、审美情趣与生存方式等等争得发展权，这是对西方男权社会的反拨。但在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讲究“天人合一”，“男主外女主内”；一方面则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妇女从来都是依附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从未给女性以独立发展的空间，妇女们不仅被严酷地禁锢在“家族”之内，更被弱化成男性文化的附属品，“男主女从”，天经地义，连女子也视为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从文化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为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呼吁社会把妇女当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人”来看待，而不再把妇女看成家族的、男性的附庸。他们引进西方的妇女观，介绍西方女权运动发展现状，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妇女观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他们顶呼吁妇女从被奴役的恶梦中醒来，明白“自己也是个人”，不再甘为他人的附庸。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把“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介绍给中国妇女，指出娜拉所以要离家出走，只是因为她觉悟了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¹¹⁾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中强调妇女的解放必须是建立在妇女个体观念的“自觉”之上的，这是妇女摆脱男性束缚的第一步，并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¹²⁾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他将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精髓的“知道你自己”引入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¹³⁾

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年版 第26页8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 第55页9 《鲁迅全集〈两地书〉》第43页10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 第55页

6)

7) (2) 针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女子教育，为新的妇女观的普及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近代以来，发展女子教育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共识，相对稳步发展起来的各级女子学堂、教会女子大学，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包括勤工俭学在内的各类女子教育，便是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共识下具体操作的成果。但五四运动后，随着新一轮参政热的出现及人们对妇女经济问题的关注，女子教育似乎不再成其为“大问题”了。针对这种情况，1922年11月6日，梁启超在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中强调，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的平等权，二是职业上的平等权，三是政治上的平等权。“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¹⁴⁾（《人权与女权》）在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多元共进的社会环境下，梁启超的提醒不会没有作用，但也不再具有“振臂一呼”的效果了。

总之，“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观，并非是一些文化精英或那个时代的其他有识之士的“发明创造”，而是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改造社会和传统文化，主要从西方引进的“他山之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必然具有以下特色：一、它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无论是阶级论和社会主义观，还是人性论和个人主义观，都无不具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缺乏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西方文化色彩；二、它必然一开始就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和性等各个层面的完整体系；三、由于一二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思想比较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因而在妇女观的引进、宣扬和实施主张方面，也就必定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鲁迅的择取，其独特性也十分明显，它主要把目光投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不是热衷于域外理念的介绍和呼吁，而是更多地关注域外理念引进之后的实际情形，即域外理念与中国现实实际的时代落差。他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以及后来的小说《伤逝》的创作都与他的这种思考不无关系，当然与自身独特的人生轨迹也有直接关联。鲁迅的思考无疑是独特的，现实的，具有警示性的，但又不是让人裹

7)11) 《胡适全集》第一卷 第613页。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季羨林主编 2003年出版12) 《永日集》 岳麓出版社 1988年版 第95
页13) 《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192年 第3页14) 《饮冰室合集》

第三十九, 中华书局出版, 1936年版, 第86页

足不前，而是审慎行事，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尤其是经济上的准备。从这一点来看，鲁迅先生的思考是很具建设性的。不管怎样都不外乎那一句话：妇女解放，任重而道远！

III. 《伤逝》对“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观照

(1) 《伤逝》的爱情模式

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运动，其始作俑者是由男人们担当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要向前发展，作为社会一般力量的女性却长期处于无识无知的生长停滞阶段，给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2) 个性解放的需要。在中国妇女权利问题是被当作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妇女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重视；(3) 受西方学说的影响。西学东渐，西方妇女运动发展给了当时部分钦慕西方社会制度的中国知识阶层以启发和感染；

(4) 当时的中国女性不具备足够的力量。中国的女性长期处于严酷的性别压抑之下，缺乏对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的清醒认识，也缺乏进行反抗的知识和教育储备。总之，这种情况在《伤逝》中体现得比较明显。涓生和子君的角色分配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关系，二人的爱情故事从开始、发展、高潮到结束，都是由涓生主导的，子君只起到领受和协从作用。两人谈家庭专制，谈打破就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时只有涓生一人的声音，子君只是从旁“微笑点头，两眼弥漫着想好奇的光泽”¹⁵⁾。⁸⁾当涓生指给她墙壁上的一张雪莱的半身像时，子君“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¹⁶⁾，明子君的脑子里旧思想尚有市场，需进一步的开化和不断输入新知。二者的关系很像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一个在激情满怀地慷慨宣讲，一个在孜孜不倦地心领神会。二人相处了半年时间后，导师的教学目的初见成效，作为学生的子君坚定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¹⁷⁾从此，涓生与子君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便不把“老东西”、“小东西”等好事者放在眼里啦。此后的生活虽免不了各种干扰和波折，但二人决定生活在一起，用行动践行个性解放思想，由自己来主宰自己的爱情和未来生活。

8)15)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617页 16)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618页 17)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618页

所以,《伤逝》的创作既反映了鲁迅对时代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反映了他本人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细心谋划。不过,这由男人引导的个性解放运动,其局限性也十分突出,作为启蒙者的涓生比被启蒙者子君多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和时尚的思想教条,至于,这种从西方贩来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到底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却一无所知。作为启蒙者的涓生向受启蒙者子君示爱的仪式也很幼稚地仿效了西方电影中绅士向小姐单膝跪拜求爱的一幕。总之,时尚化、概念化、西方化的味道较浓,这一切仿佛都预示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到底能走多远?因为二人的选择仅仅是把思想上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演绎了一遍,而双方家庭和社会一致把这一行为视为离经叛道、伤风败俗。鲁迅思考的落脚点恰恰放在了“出走”后的“同居”生活,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毕竟,被一些慷慨激昂的新名词所激动是容易的,真正地理解它并在实践中贯彻它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主观能力上的储备,人首先应该生活着,爱才有附丽,爱才能持久。

(2)《伤逝》的家庭模式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提倡四种权力:“政治及公共活动参与权”、“经济独立权”、“婚姻及家庭生活自由权”、“教育权”。¹⁸⁾ 而在《伤逝》中的子君已在自己的旧家庭获得了“教育权”,这说明她的旧家庭也有开化的一面,并不是顽固不化的铁板一块,后来子君被其父接走也不要轻易做出最坏的一种结论,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对自己爱情幻灭的绝望。此外,子君在涓生的导引下,经双方共同努力获得了“婚姻及家庭生活自由权”,可这种权利的有效限域仅在二人之间,其家庭和社会是不认可的。不管怎样,涓生和子君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有了一个可以经营二人感情的自由空间,娜拉走后怎样的序幕就此拉开。问题是他们到底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呢?白天涓生去局里上班,子君在家里洗洗涮涮忙家务,不久又饲养了几只小油鸡和一只叫“阿随”的宠物狗。如果说二人的家与邻家(旧家)有什么区别,恐怕只有那只宠物狗“阿随”。这在当时的中国都市唯有崇尚西式生活的贵妇人家才有的景致。可子君不同于贵妇人,她要从早忙到晚。那些脑子里不多的新名词逐一被凡俗的琐屑生活所替换,子君一天想的只是如何把饭食做得好些,如何把小油鸡和“阿随”喂养的比邻家壮实些。自搬到吉兆胡同以来,二人一个忙外一个忙内,连谈天的功夫都没有,读书和散步的项目也早已从生活中挤掉。思想的资源一天天被蒸发,而无新的补充进来,两个人的生活只余下一个回味的乐趣。涓生

9)18同上

和子君也由过去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转换为赚钱人和持家人，愈来愈接近俗世中的饮食男女，生活仿佛恢复了旧轨道。子君羡慕邻家的油鸡比自己养得的肥硕，她几乎忘了自己曾是一个最求个性解放、自主婚姻的新女性。拮据的生活使子君的颜色一天天暗淡下去，不快的时候也便多起来，手也变得日益粗糙。为此，做丈夫的涓生也暗暗自责：不能为自己心爱的女人置一个独立的房子，再花一些钱雇一个女工帮佣。两人同居以来，生活的不便和尴尬令他们不得不面对“经济”这个大问题。事实证明：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不好，新家也会变为旧家，新人也会成为旧人。是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精神决定物质，除非具有变精神为物质的强大的主体能力。总之，涓生和子君建立的新家处在风雨飘摇中，如果二人不思变革，或无外力相助，这个家庭的散板是早晚的事。空谈是容易的，所以不持久；物质是坚固的，所以才久远。涓生和子君苦苦建立起来的新家，其实是名新实旧，不过是中国20世纪初版的“男耕女织”图，这不能不是鲁迅所担心和预想到的，也是对西方女权运动在当时中国现实翻版的最好脚注。中国的个性解放运动若不与强大的社会变革相配合，一切只能是纸上谈兵，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3)《伤逝》中的一对男女青年

涓生和子君无疑是鲁迅精心勾画的觉醒了的时代青年代表，他们有新知、有觉悟、有勇气倡导和践行个性解放思想，其开风气之先的前导作用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曾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问题是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女娜拉们在挣脱束缚后才发现并没有获得他们当初梦想的那样一种完满的幸福，“追求的憧憬虽然到了手，却在到手的一刹那间改变了面目”¹⁹⁾。¹⁰⁾鲁迅自己也是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一分子，不过，它比同时代的人想得深远一些，实际一些。在一个有两千年封建文化积淀的社会实践个人的自由爱情，除了男女双方的个人感情基础外，还需要尽力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因为两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极其微弱和渺小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韧性战斗精神，而不是遭遇挫折就灰溜溜地“回来”。否则，此时的“解放个性”产生的“盲目的爱”必然使无论传统或现代的爱者陷入痛苦的境地，甚至是绝望。小说中的开篇第一句：“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

10)19)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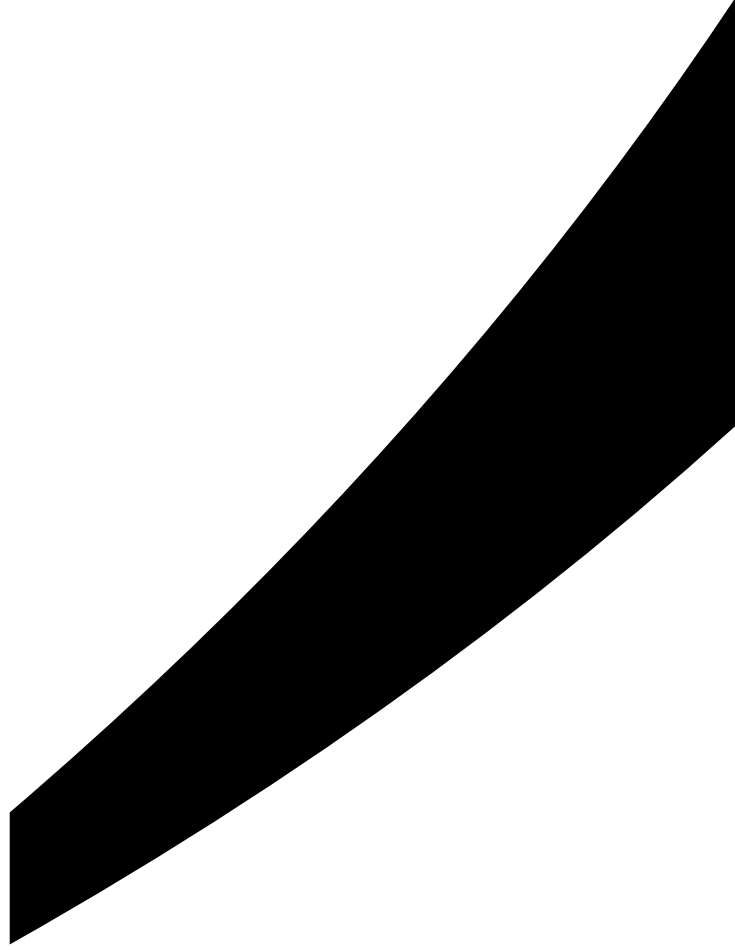
出版社2004年版 第259-267页

子君，为自己。”²⁰⁾ 这是曾经作为导师和启蒙者的涓生对作为学生和受启蒙者的子君所留下的惭愧和自责的话语，不知他是悔恨过去的思想和行为，还是单为子君的死？笔者还是愿意把二者的爱情悲剧引导到当时的个性解放运动，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娜拉们走后的一种宿命归宿。涓生和子君的婚后生活虽然精神色彩少了，却也不乏俗世的乐趣和温馨，如涓生的伙食比以前好了，子君也比以前胖了，但二人的生活明显从过去单纯的精神活动过渡到实在的物质活动。所以当他们在收到局里的辞退信时，一个心跳加快，一个变了颜色，家庭的气氛已下降至冰点。从此二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直至饭菜不够，不久油鸡们变成了餐桌上的佳肴，“阿随”也被放生野外。涓生丢了工作时，子君的最初反应是“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²¹⁾ 给人的印象子君似乎不太满意丈夫薪水微薄的工作，这下可以另谋生路，或许还能找到更理想的工作，好好改善艰窘的家庭处境。可后来的是事实是不仅涓生求职的广告无着，投稿所得也微乎其微难以继。二人的颜色变得越发难看，而且相互影响，迫使涓生滋生了一个自私的想法：甩掉子君这个多余的包袱，开辟所谓的新的生路，此时的子君由昔日的爱情伴侣和战友转瞬间变成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涓生对子君是这样讲的“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需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吧：‘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的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²²⁾ ¹¹⁾ 从以上对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涓生作为启蒙者的书生气，好似他不是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现实，选择“同居”的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他那里反倒成了好事，有爱便生活在一起，爱没有了便各奔前程，而且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悲壮的牺牲者角色，拿出了还你自由你可以另择高枝而栖的姿态，免得跟我受苦，免得跟我一同灭亡。可谓道理讲得进退有据，条条利他，全没有想到子君“回来”（回到旧家）会怎样？直到得知子君死了，他才恍然醒悟。真不知涓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还是极端自私的伪君子。当然过分的揣度只会偏离文本的原意，笔者还是宁愿把涓生归结为一个不成熟的、或不称职的导师和启蒙者，所以学生子君的死与他的误导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尽管他的处境也很糟糕，也落得不得不另外择地他谋。二人家庭的散板当中子君的责任也不小。¹²⁾ 子君尽管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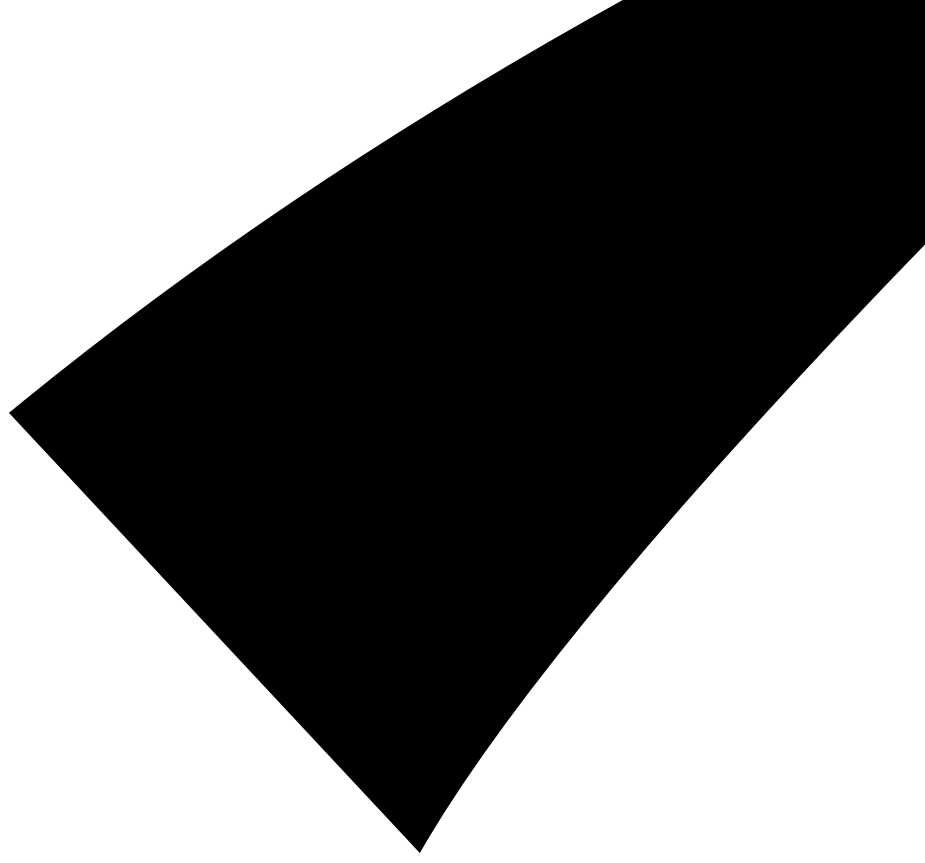
11)20) 茅盾《追求》21)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 月 第 一 版 第 1 6 1 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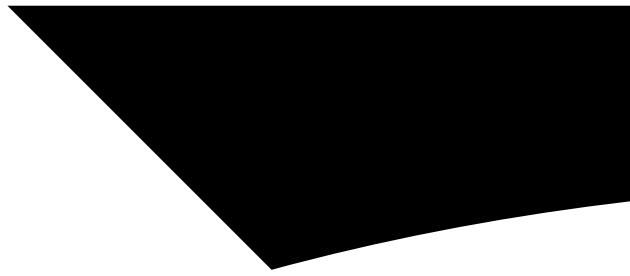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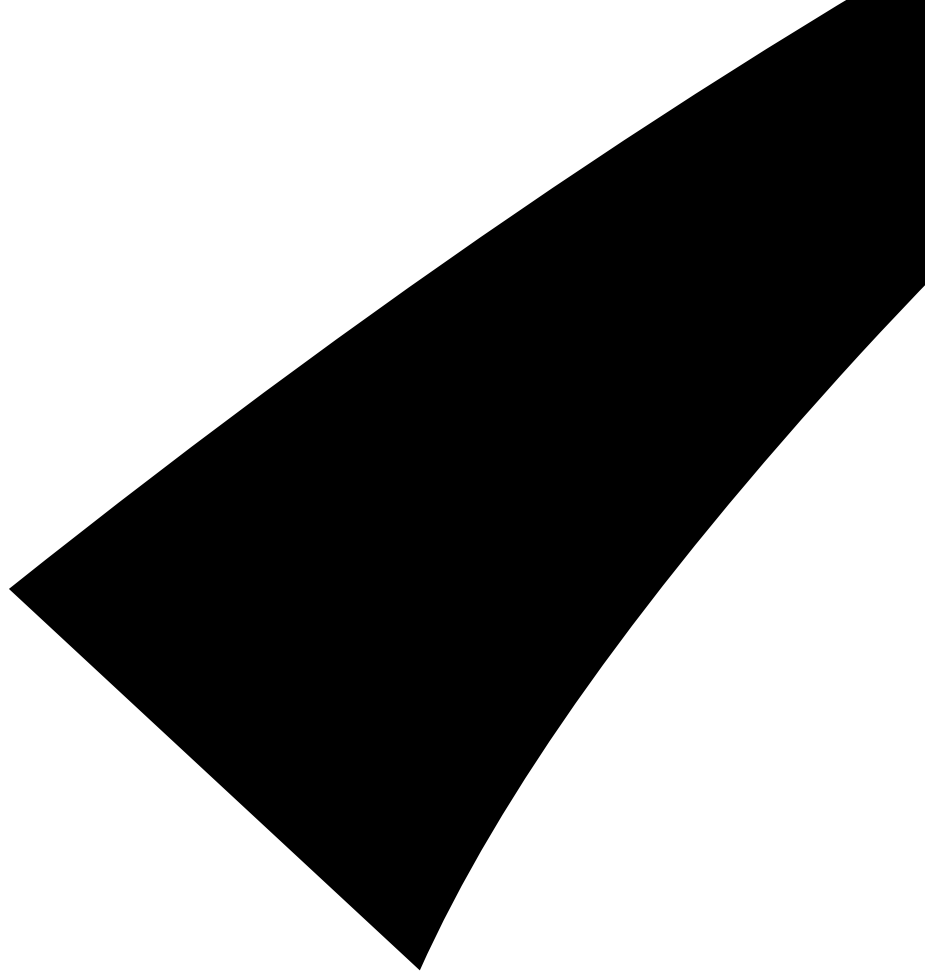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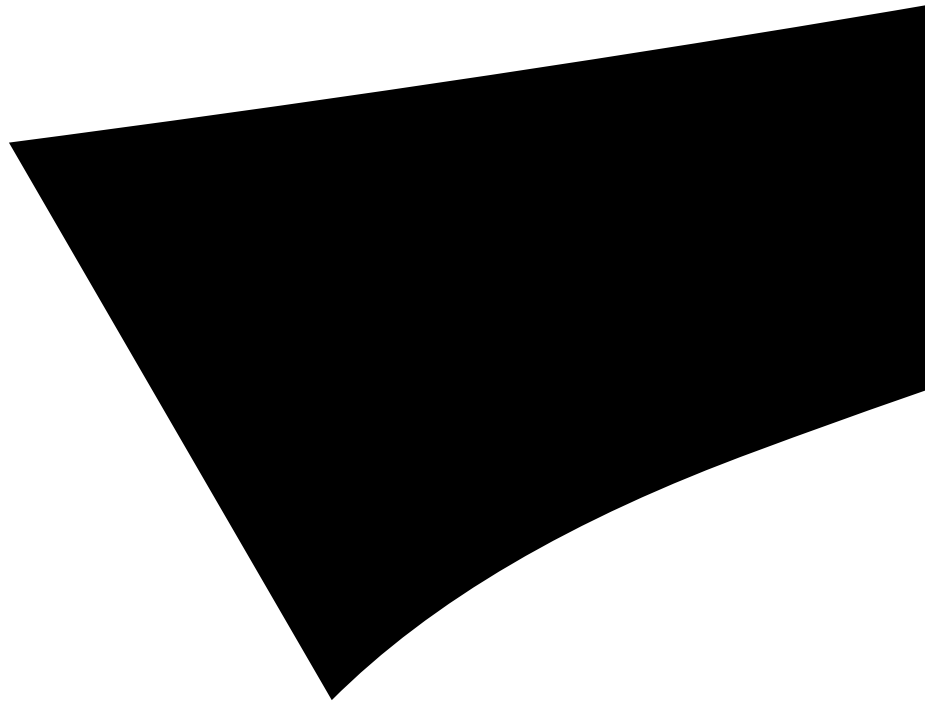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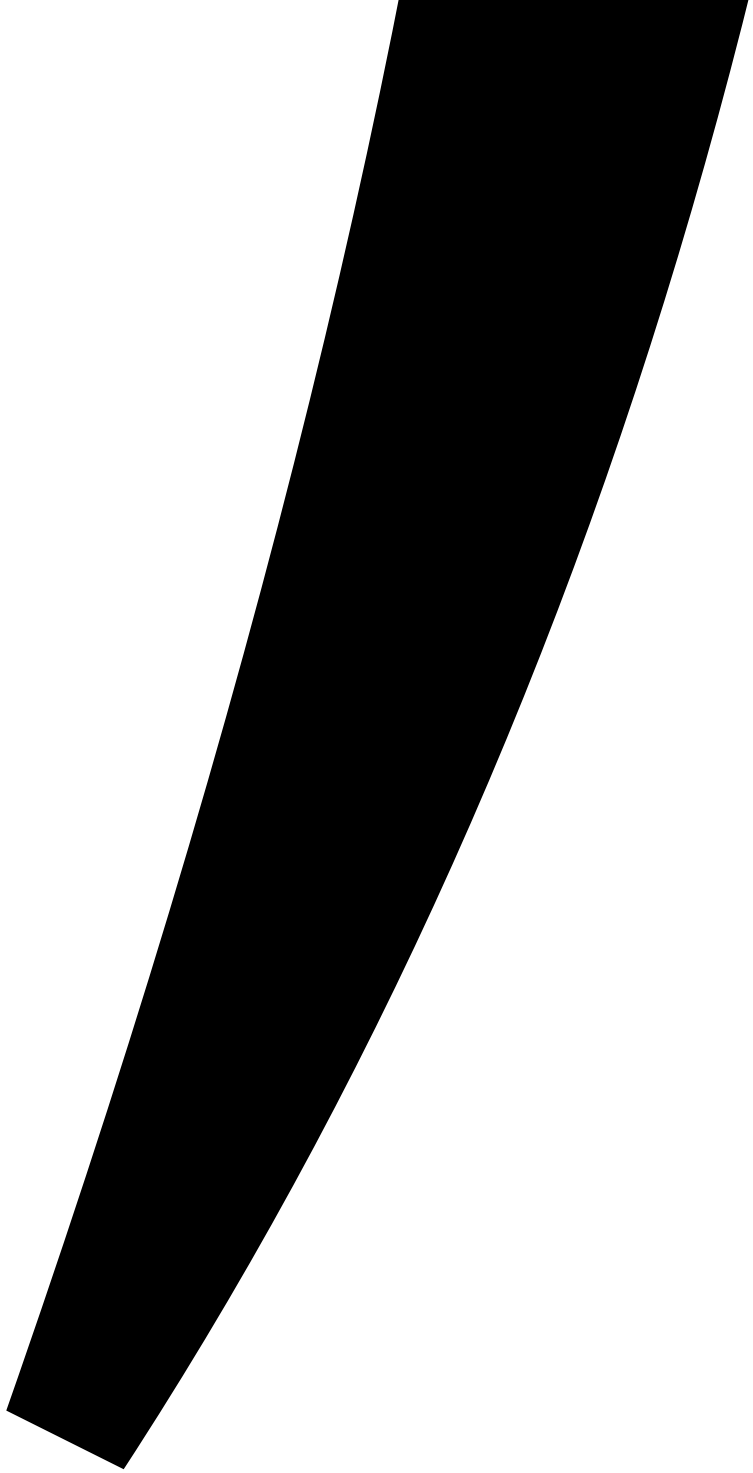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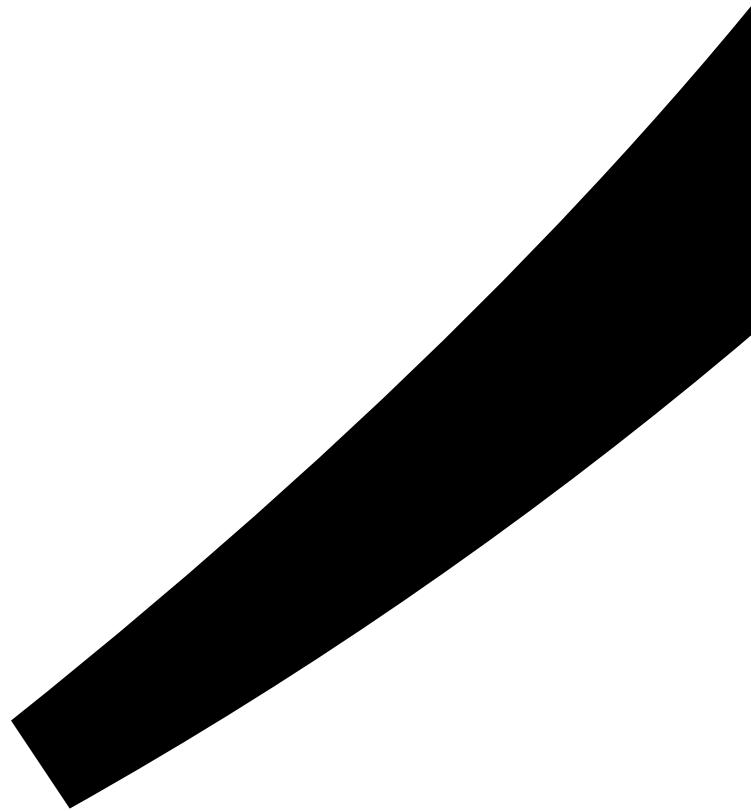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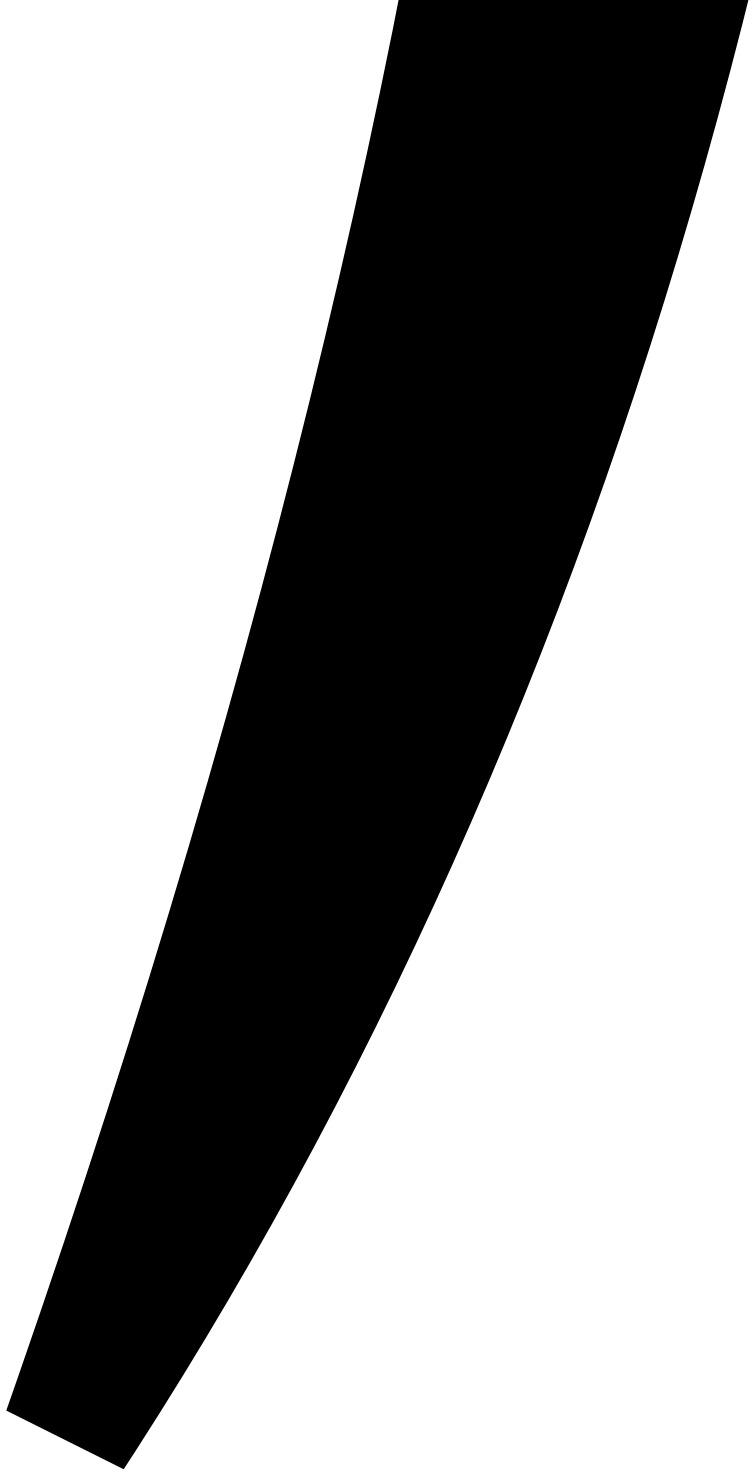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涓生的引导下“出走”，勇敢地选择了自己的爱情生活，但她把这当成了终点，似乎有情人终成眷属“革命”便大功告成。难怪涓生埋怨：“他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人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²³⁾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中国的个性解放运动不可能解决妇女的“经济独立权”问题，所以当时的个性解放不过是通过自由恋爱找到一个自己的心上人，或建立一个家庭，或同居。无论是启蒙者涓生还是受启蒙者子君都没有深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二人的新家说到底还是“男耕女织”的旧家庭模式。涓生的任务是如何赚钱养家，子君的职责是如何尽心持好家。作为新女性的子君从未考虑参与社会活动来获得独立的经济权，而是躲在家里考虑如何侍奉好丈夫，饲养好家禽，一个受了新式教育的时代女性不知不觉地飞回到生活的原点。关于这一点，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的人物吕纬甫有一段自我调侃的话来互涉，“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霍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费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是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个小圈子。”²⁴⁾ 社会没有给子君们获取独立的经济权创造条件，涓生们也没有在家庭里为她们创造条件，子君们也没有向社会和丈夫自觉地索取独立的经济权。子君们从旧家庭出发最后又回归到旧家庭模式里，虽然不是平面上画圈，但毕竟与愿望相差甚远，其实质性意义也应该大打折扣。这说明由男人引领的个性解放运动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开创意识比较稀薄和乏力。难怪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单提妇女的“经济权”问题不是没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涓生们也好，子君们也好，他们的因袭重负太重，传统与现代的因素相互交融在一起，恐怕前进中要有迂回，进步中要有退步，尤其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残酷现实里。这一现象在作者鲁迅身上也同样存在，他既包容了传统的妻子朱安，也接纳了新式女性许广平，不管有多大的客观原因所迫，毕竟都是鲁迅本人的选择。有时我们想：鲁迅为什么肯了呢？这没有用，假设是没有意义的。¹³⁾

12)

13)23)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624页24) 《鲁迅全集〈在酒楼上〉》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573页

IV. 结语

鲁迅在《伤逝》中演绎了中国的娜拉们走后怎样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他看问题总比他同时代的人看得尖锐、深刻，更注重现实性和时效性，但长于垫付，困于建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难免存在捉襟见肘的地方。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影响的，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诚，从海外贩来新知，沸腾了多少青年的热血，也最终形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巨大洪流，其中也包括鲁迅等人的功劳，在历史急剧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改变必然先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但处于变革过程中那些意识超前的人们首当其冲要受到冲击，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不妨把《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看成类似的先行者。鲁迅不是不明白有些牺牲的不可避免性，但她不像政治革命家关注牺牲的必要性问题，而是如何减少牺牲，把牺牲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其中尤其关怀社会的弱势群体，如《伤逝》中的子君，而不是涓生。鲁迅选择在女师大做《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其良苦用心也是否在此。至于《伤逝》的涓生必须忏悔和自省，原因是你让人家醒来却无路可走。实际上，鲁迅是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基础上再一次用小说的形式深入启蒙那些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中国娜拉们。鲁迅在《伤逝》提出问题后便身体力行，他与许广平南下分头奋斗好为将来的新生活准备积蓄，直到1927年8月才结束天各一方的离散生活。鲁迅这样的大文豪尚且需要如此的勇气和付出，何况千千万万的涓生、子君？真可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诸君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鲁迅全集〈随想录四十〉》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
- 《鲁迅全集〈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 《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陈独秀在广东女屈联合会上的演讲稿，1921年。
- 《鲁迅全集〈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
- 《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季羨林主编 2003年出版。
- 《永日集》岳麓出版社 1988年版。
- 《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1922年。
- 《饮冰室合集》第三十九，中华书局出版，1936年版。
-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 茅盾《追求》。
- 《鲁迅全集〈在酒楼上〉》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 《近年来〈伤逝〉研究综述》渝西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 第03期。
- 《谈鲁迅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8年 第06期。
- 《从女性视角看〈伤逝〉中的爱情悲剧》教育前沿·综合版 2008年 第07期。
- 《鲁迅〈伤逝〉思想的重新审视和界说》贵州社会科学 1996年 第06期。
- 《〈伤逝〉意蕴新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 第01期。
- 《论鲁迅的女性观》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 第06期。
- 《浅论鲁迅的妇女解放观》长治学院学报 2005年 第02期。
- 《〈伤逝〉爱情悲剧探源》绥化学院学报 1988年 第03期。
- 《论〈伤逝〉的反封建性》安徽文学 2008年 第06期。

梦醒了无路可走

——从《伤逝》看鲁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思考

洪永春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伤逝》中的主人公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作者鲁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思考：爱情模式、家庭模式和男女双方的主观不

足。从而，让人们更清晰地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个性解放；爱情模式；家庭模式

Having no way out when you awake

From "Shangshi" to see Lu Xun's unique thinking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Hong Yongchun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love tragedy of Juan Sheng and Zi Jun who are the dramatis personae in "Shangshi", this paper reveals Lu Xun's deep thinking for the women's liberation during "May 4th" period: Love Style, Family Style and their subjective shdrtages. Thus, let people learn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more clearly.

Key words: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Love Style; Family Style.

梦醒了无路可走

——从《伤逝》看鲁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思考

洪永春* 朴宰雨**

<目次>

1.引言

2.鲁迅对“五四”妇女解放观的独特选择

3.《伤逝》对“五四”妇女解放观的独特观照

3.1《伤逝》的爱情模式

3.2《伤逝》的家庭模式

3.3《伤逝》中的一对男女青年

4.结语

1.引言

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21日，后收在他的小说集《彷徨》里。鲁迅一生的著述甚多，但关于爱情题材的小说仅此一篇，迥异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创作。或许，这与鲁迅不幸的旧式婚有直接关联，未等爱情之花怒放，便急数地枯萎了，而他等来许广平迟到的爱时已步入不惑之年，爱的感觉中恐怕少了许多浪漫和憧憬的成份。其实，早在1919年写的他的《随想录四十》里，鲁迅借一少年的爱情诗道出了自己情感生活的苦闷，其中的一段议论甚是符合他的寂寞处境和无奈选择。“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¹⁾ ¹⁴⁾最后又在文中附上这样一句话：“旧账如何购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²⁾而鲁迅让下一代自由选择爱情和生活的见解在同年10月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再次阐述过。显然，鲁迅是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赞扬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但作为过来人的鲁迅更关心如何把这一思想和实践落实到实处，而不是从口号到口号和实践上的半途而废。鲁迅在1923年12月的《娜拉走后怎样》

14) 中国 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 chishui1314@163.co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1) 《鲁迅全集〈随想录四十〉》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14页2) 《鲁迅全集〈随想录四十〉》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15页3)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 第55页

后怎样》的讲演中提到：“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免不了堕落或回来。”³⁾鲁迅的思考是把易卜生的《娜拉走后怎样》作为其思考的逻辑起点，而且从最坏处打算可能会有如上两种结局。事隔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恰好，1925年的3月鲁迅的爱情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机，小说《伤逝》也便伴随着诞生了。

2. 鲁迅对“五四”妇女解放观的独特选择

纵观“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观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层面仍然是政治的，即主张男女平权与妇女参政。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继续，但却赋予了新的含义。辛亥革命时期，尽管已经有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但真正的西方妇女观并没有广泛普及，当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像秋瑾那样的自求解放的妇女，其主体思想还是反清和政治体制的变革。

经历过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民初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对“革命”与“政体变革”大失所望的普遍心态。用鲁迅的话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什么都要从新做过”⁴⁾（《华盖集·忽然想到》）。在共和政体之下，知识分子们新一轮的抗争开始了，这就是以陈独秀《新青年》为号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层面的，它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以新文化为手段，以反对非人的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为目标，以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解放人、解放个性为其精神价值取向。

新文化运动也赋予了妇女解放以新的含义。概观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妇女政治解放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1) 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尊孔复古”逆流，反其道而行之，将妇女的政治解放定位于反对封建礼教奴役，争取政治人格独立。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而其中的“夫为妻纲”，则把妇女置于夫权之下，剥夺了妇女的参政权。为此，陈独秀号召：“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⁵⁾¹⁵⁾ 在政治上，妇女的人格独立有

15) 4) 《鲁迅全集·华盖集·忽然想到》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60页 5) 《独秀文存》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第56

两层含义，一是要在社会上确立妇女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二是要妇女建立自己的独立参政意识，不再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轻委他人。经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特别是反孔老英雄吴虞等人的努力，应该说，其社会政治效果最为显著。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来的知识妇女也日渐增多，她们不同于秋瑾时代的妇女，以参政为自我解放之首选，而是在更广泛、更切实际的层面，开始了自我拯救运动，包括挣脱旧式婚姻束缚、¹⁶⁾争取恋爱自由、谋求教育与职业的权利等等，政治舆论的转向，无疑为她们创造了一定的条件。¹⁷⁾

(2)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与普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妇女政治解放的新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妇女与劳工是社会最没有能力的、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问题，离了社会主义，“断不会解决的”。因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但“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所以，“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⁶⁾李大钊在他的几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概言之，“五四”时期的妇女政治解放理论，由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逆流而起，以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思想为过渡，至确立“社会主义”理想终。

2)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层面是经济的，即妇女如何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如何自谋职业，如何拥有与男子一样的财产继承权等，这是这一时期妇女研究的新动向。在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从政治上探索妇女解放之路的同时，另一些则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的经济问题，其中尤以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影响最广。辛亥革命后的复辟帝制与“尊孔复古”逆流，激发了陈独秀等人更高涨的政治热情，

页

16)

17)

导出更先进的政治理想；但对鲁迅而言，则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上。“重新做过”即“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⁷⁾，在妇女问题上也是如此。

理想主义者浪漫地将“娜拉”介绍给中国女界，现实的鲁迅则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而且毫不客气地指出，出走后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论断让人扫兴，却是中国的现实。翻开民国报刊，因争取独立或恋爱自由而出走的女性，少有完满结局的。她们不是以恋爱失败告终，就是以谋生无着而“堕落”或“回来”，回到封建大家族中去，过比以前还不如的日子，甚至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鲁迅告诫女孩子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方法。”⁸⁾（《娜拉走后怎样》）深知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也要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的鲁迅，要民国的年轻知识女性们作好“壕堑战”的准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⁹⁾（《两地书》）；在争取经济权上，则要她们发扬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¹⁰⁾（《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开导，早已超出要经济权以外了，但在要经济权这一点上，鲁迅的指令是简单、清晰而执著的。再次，“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探索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的，即如何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论的时代特色，也是其主要的历史功绩

人的解放是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为前提，又是以文化观念的更新为结果的，妇女解放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要的是个性的解放，是对自由意识的追求，这离中国妇女的现实相距甚远。如何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广大妇女自觉的行动，就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课题。¹⁸⁾

18)6) 陈独秀在广东女届联合会上的演讲稿，192年《鲁迅全集〈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年版 第26页8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 第55页9 《鲁迅全集〈两地书〉》第43页10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

综观这一时期一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化上的大讨论，如伦理、道德、爱情、贞操、婚姻、家庭、育儿、独身、社交、教育等，就文化观念而言，概括起来无非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 针对封建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一元妇女观，提出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二元妇女观，进而养成妇女在追求自我解放观念上的自觉。¹⁹⁾西方的妇女运动是建立在“为人或为女的两重自觉”基础上的，它不仅要求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政治权、经济权和教育权，更重要的是它要为女性特有的思维、心理、价值观、审美情趣与生存方式等等争得发展权，这是对西方男权社会的反拨。但在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讲究“天人合一”，“男主外女主内”；一方面则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妇女从来都是依附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从未给女性以独立发展的空间，妇女们不仅被严酷地禁锢在“家族”之内，更被弱化成男性文化的附属品，“男主女从”，天经地义，连女子也视为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从文化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为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呼吁社会把妇女当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人”来看待，而不再把妇女看成家族的、男性的附庸。他们引进西方的妇女观，介绍西方女权运动发展现状，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妇女观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他们则呼吁妇女从被奴役的恶梦中醒来，明白“自己也是个人”，不再甘为他人的附庸。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把“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介绍给中国妇女，指出娜拉所以要离家出走，只是因为她觉悟了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¹¹⁾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中强调妇女的解放必须是建立在妇女个体观念的“自觉”之上的，这是妇女摆脱男性束缚的第一步，并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¹²⁾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他将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精髓的“知道你自已”引入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已’，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¹³⁾

²⁰⁾ (2) 针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女子教育，为新的妇女观的普及

一版 第55页

19)

20) 11) 《胡适全集》第一卷 第613页。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季羨林主编 2003年出版 12) 《永日集》 岳麓出版社 1988年版

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近代以来，发展女子教育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共识，相对稳步发展起来的各级女子学堂、教会女子大学，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包括勤工俭学在内的各类女子教育，便是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共识下具体操作的成果。但五四运动后，随着新一轮参政热的出现及人们对妇女经济问题的关注，女子教育似乎不再成其为“大问题”了。针对这种情况，1922年11月6日，梁启超在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中强调，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的平等权，二是职业上的平等权，三是政治上的平等权。“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¹⁴⁾（《人权与女权》）在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多元共进的社会环境下，梁启超的提醒不会没有作用，但也不再具有“振臂一呼”的效果了。

总之，“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观，并非是一些文化精英或那个时代的其他有识之士的“发明创造”，而是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改造社会和传统文化，主要从西方引进的“他山之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必然具有以下特色：一、它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无论是阶级论和社会主义观，还是人性论和个人主义观，都无不具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缺乏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西方文化色彩；二、它必然一开始就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和性等各个层面的完整体系；三、由于一二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思想比较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因而在妇女观的引进、宣扬和实施主张方面，也就必定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鲁迅的择取，其独特性也十分明显，它主要把目光投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不是热衷于域外理念的介绍和呼吁，而是更多地关注域外理念引进之后的实际情形，即域外理念与中国现实实际的时代落差。他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以及后来的小说《伤逝》的创作都与他的这种思考不无关系，当然与自身独特的人生轨迹也有直接关联。鲁迅的思考无疑是独特的，现实的，具有警示性的，但又不是让人裹足不前，而是审慎行事，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尤其是经济上的准备。从这一点来看，鲁迅先生的思考是很具建设性的。不管怎样都不外乎那一句话：妇女解放，任重而道远！

第95页13) 《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1922年 第3页14) 《饮冰室合集

集》第三十九, 中华书局出版, 1936年版, 第86页

3. 《伤逝》对“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观照

3.1 《伤逝》的爱情模式

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运动，其始作俑者是由男人们担当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要向前发展，作为社会一般力量的女性却长期处于无识无知的生长停滞阶段，给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2) 个性解放的需要。在中国妇女权利问题是被当作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妇女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重视；(3) 受西方学说的影响。西学东渐，西方妇女运动发展给了当时部分钦慕西方社会制度的中国知识阶层以启发和感染；(4) 当时的中国女性不具备足够的力量。中国的女性长期处于严酷的性别压抑之下，缺乏对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的清醒认识，也缺乏进行反抗的知识和教育储备。总之，这种情况在《伤逝》中体现得比较明显。涓生和子君的角色分配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关系，二人的爱情故事从开始、发展、高潮到结束，都是由涓生主导的，子君只起到领受和协从作用。两人谈家庭专制，谈打破就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时只有涓生一人的声音，子君只是从旁“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¹⁵⁾。²¹⁾当涓生指给她墙壁上的一张雪莱的半身像时，子君“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下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¹⁶⁾，明子君的脑子里旧思想尚有市场，需进一步的开化和不断输入新知。二者的关系很像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一个在激情满怀地慷慨宣讲，一个在孜孜不倦地心领神会。二人相处了半年时间后，导师的教学目的初见成效，作为学生的子君坚定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¹⁷⁾从此，涓生与子君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便不把“老东西”、“小东西”等好事者放在眼里啦。此后的生活虽免不了各种干扰和波折，但二人决定生活在一起，用行动践行个性解放思想，由自己来主宰自己的爱情和未来生活。所以，《伤逝》的创作既反映了鲁迅对时代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反映了他本人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细心谋划。不过，这由男人引导的个性解放运动，其局限性也十分突出，

21)15)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617页 16)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618页 17)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618页

作为启蒙者的涓生比被启蒙者子君多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和时尚的思想教条，至于，这种从西方贩来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到底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却一无所知。作为启蒙者的涓生向受启蒙者子君示爱的仪式也很幼稚地仿效了西方电影中绅士向小姐单膝跪拜求爱的一幕。总之，时尚化、概念化、西方化的味道较浓，这一切仿佛都预示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到底能走多远？因为二人的选择仅仅是把思想上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演绎了一遍，而双方家庭和社会一致把这一行为视为离经叛道、伤风败俗。鲁迅思考的落脚点恰恰放在了“出走”后的“同居”生活，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毕竟，被一些慷慨激昂的新名词所激动是容易的，真正地理解它并在实践中贯彻它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主观能力上的储备，人首先应该生活着，爱才有附丽，爱才能持久。

3.2 《伤逝》的家庭模式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提倡四种权力：“政治及公共活动参与权”、“经济独立权”、“婚姻及家庭生活自由权”、“教育权”。^{18) 22)}而在《伤逝》中的子君已在自己的旧家庭获得了“教育权”，这说明她的旧家庭也有开化的一面，并不是顽固不化的铁板一块，后来子君被其父接走也不要轻易做出最坏的一种结论，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对自己爱情幻灭的绝望。此外，子君在涓生的导引下，经双方共同努力获得了“婚姻及家庭生活自由权”，可这种权利的有效限域仅在二人之间，其家庭和社会是不认可的。不管怎样，涓生和子君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有了一个可以经营二人感情的自由空间，娜拉走后怎样的序幕就此拉开。问题是他们到底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呢？白天涓生去局里上班，子君在家里洗洗涮涮忙家务，不久又饲养了几只小油鸡和一只叫“阿随”的宠物狗。如果说二人的家与邻家（旧家）有什么区别，恐怕只有那只宠物狗“阿随”。这在当时的中国都市唯有崇尚西式生活的贵妇人家才有的景致。可子君不同于贵妇人，她要从早忙到晚。那些脑子里不多的新名词逐一被凡俗的琐屑生活所替换，子君一天想的只是如何把饭食做得好些，如何把小油鸡和“阿随”喂养的比邻家壮实些。自搬到吉兆胡同以来，二人一个忙外一个忙内，连谈天的功夫都没有，读书和散步的项目也早已从生活中挤掉。思想的资源一天天被蒸发，而无新的补充进来，两个人的生活只余下一个回味的乐趣。涓生和子君也由过去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转换为赚钱人和持家人，愈来愈接近俗世中的饮食男女，生活仿佛恢复到了旧轨道。子君羡慕邻家的油鸡比自己养得的肥硕，她几乎忘了

22)18同上

自己曾是一个最求个性解放、自主婚姻的新女性。拮据的生活使子君的颜色一天天暗淡下去，不快的时候也便多起来，手也变得日益粗糙。为此，做丈夫的涓生也暗暗自责：不能为自己心爱的女人置一个独立的房子，再花一些钱雇一个女工帮佣。两人同居以来，生活的不便和尴尬令他们不得不面对“经济”这个大问题。事实证明：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不好，新家也会变为旧家，新人也会成为旧人。是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精神决定物质，除非具有变精神为物质的强大的主体能力。总之，涓生和子君建立的新家处在风雨飘摇中，如果二人不思变革，或无外力相助，这个家庭的散板是早晚的事。空谈是容易的，所以不持久；物质是坚固的，所以才久远。涓生和子君苦苦建立起来的新家，其实是名新实旧，不过是中国20世纪初版的“男耕女织”图，这不能不是鲁迅所担心和预想到的，也是对西方女权运动在当时中国现实翻版的最好脚注。中国的个性解放运动若不与强大的社会变革相配合，一切只能是纸上谈兵，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3.3 《伤逝》中的一对男女青年

涓生和子君无疑是鲁迅精心勾画的觉醒了的时代青年代表，他们有新知、有觉悟、有勇气倡导和践行个性解放思想，其开风气之先的前导作用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曾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问题是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女娜拉们在挣脱束缚后才发现并没有获得他们当初梦想的那样一种完满的幸福，“追求的憧憬虽然到了手，却在到手的一刹那间改变了面目”¹⁹⁾。²³⁾鲁迅自己也是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一分子，不过，它比同时代的人想得深远一些，实际一些。在一个有两千年封建文化积淀的社会实践个人的自由爱情，除了男女双方的个人感情基础外，还需要尽力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因为两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极其微弱和渺小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韧性战斗精神，而不是遭遇挫折就灰溜溜地“回来”。否则，此时的“解放个性”产生的“盲目的爱”必然使无论传统或现代的爱者陷入痛苦的境地，甚至是绝望。小说中的开篇第一句：“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²⁰⁾这是曾经作为导师和启蒙者的涓生对作为学生和受启蒙者的子君所留下的惭愧和自责的话语，不知他是悔恨过去的思想和行为，还是单为子君的死？笔者

23)19)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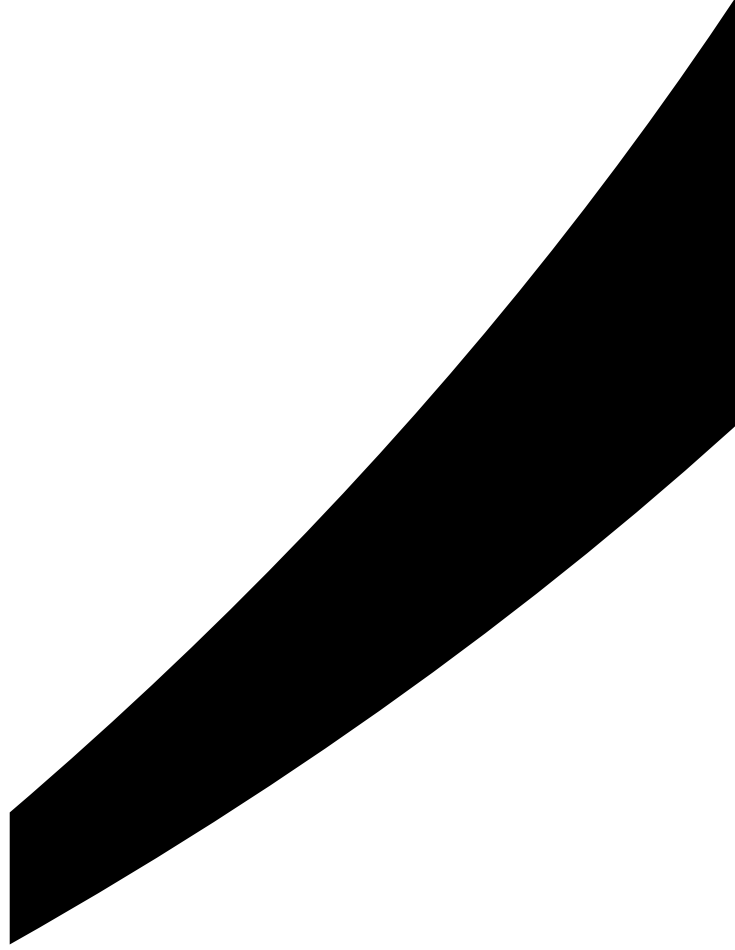
出版社2004年版 第259-267页

还是愿意把二者的爱情悲剧引导到当时的个性解放运动，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娜拉们走后的一种宿命归宿。涓生和子君的婚后生活虽然精神色彩少了，却也不乏俗世的乐趣和温馨，如涓生的伙食比以前好了，子君也比以前胖了，但二人的生活明显从过去单纯的精神活动过渡到实在的物质活动。所以当他们在局里的辞退信时，一个心跳加快，一个变了颜色，家庭的气氛已下降至冰点。从此二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直至饭菜不够，不久油鸡们变成了餐桌上的佳肴，“阿随”也被放生野外。涓生丢了工作时，子君的最初反应是“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²¹⁾给人的印象子君似乎不太满意丈夫薪水微薄的工作，这下可以另谋生路，或许还能找到更理想的工作，好好改善艰窘的家庭处境。可后来的是事实是不仅涓生求职的广告无着，投稿所得也微乎其微难以为继。二人的颜色变得越来看，而且相互影响，迫使涓生滋生了一个自私的想法：甩掉子君这个多余的包袱，开辟所谓的新的生路，此时的子君由昔日的爱情伴侣和战友转瞬变成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涓生对子君是这样讲的“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需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吧：‘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的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²²⁾ ²⁴⁾从以上对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涓生作为启蒙者的书生气，好似他不是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现实，选择“同居”的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他那里反倒成了好事，有爱便生活在一起，爱没有了便各奔前程，而且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悲壮的牺牲者角色，拿出了还你自由你可以另择高枝而栖的姿态，免得跟我受苦，免得跟我一同灭亡。可谓道理讲得进退有据，条条利他，全没有想到子君“回来”（回到旧家）会怎样？直到得知子君死了，他才恍然醒悟。真不知涓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还是极端自私的伪君子。当然过分的揣度只会偏离文本的原意，笔者还是宁愿把涓生归结为一个不成熟的、或不称职的导师和启蒙者，所以学生子君的死与他的误导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尽管他的处境也很糟糕，也落得不得不另外择地他谋。二人家庭的散板当中子君的责任也不小。²⁵⁾子君尽管是在涓生的导引下“出走”，勇敢地选择了自己的爱情生活，但她把这当成了终点，似乎有情人终成眷属“革命”便大功告成。难怪涓生埋怨：“他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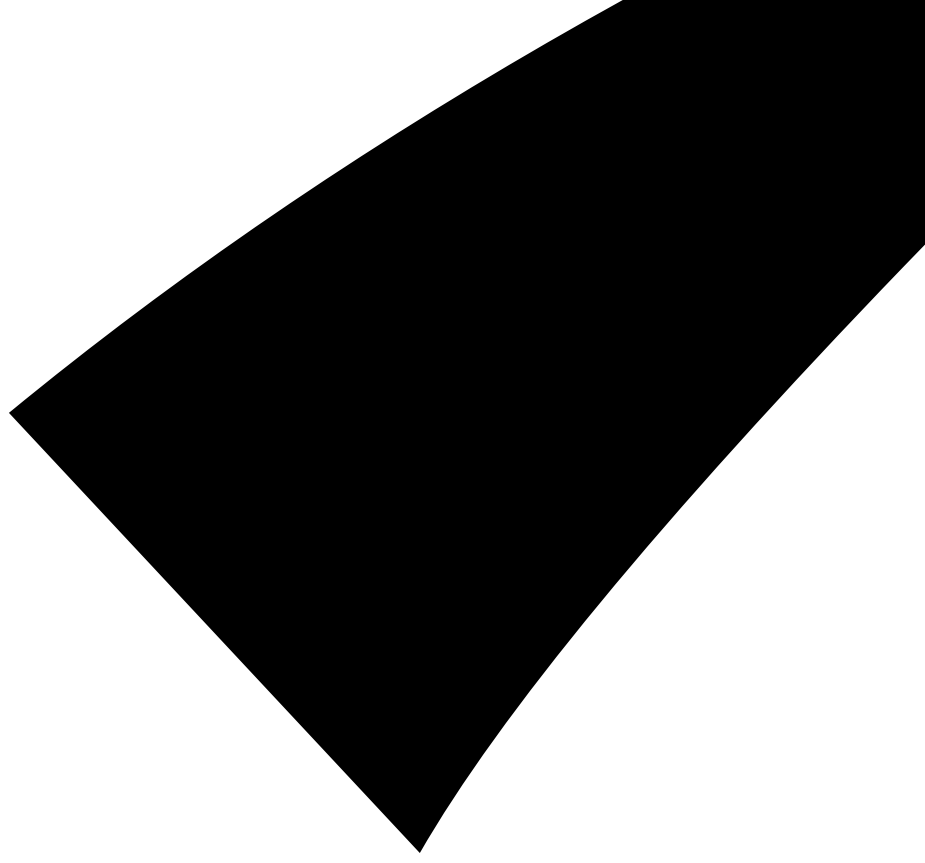
24)20) 茅盾《追求》21)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 月 第 一 版 第 1 6 1 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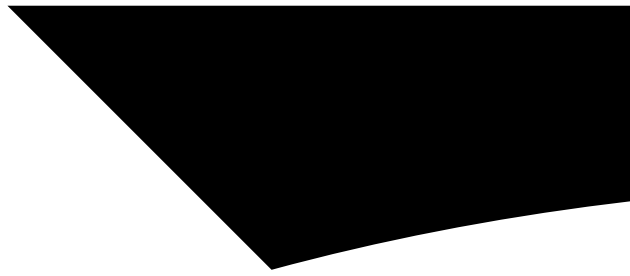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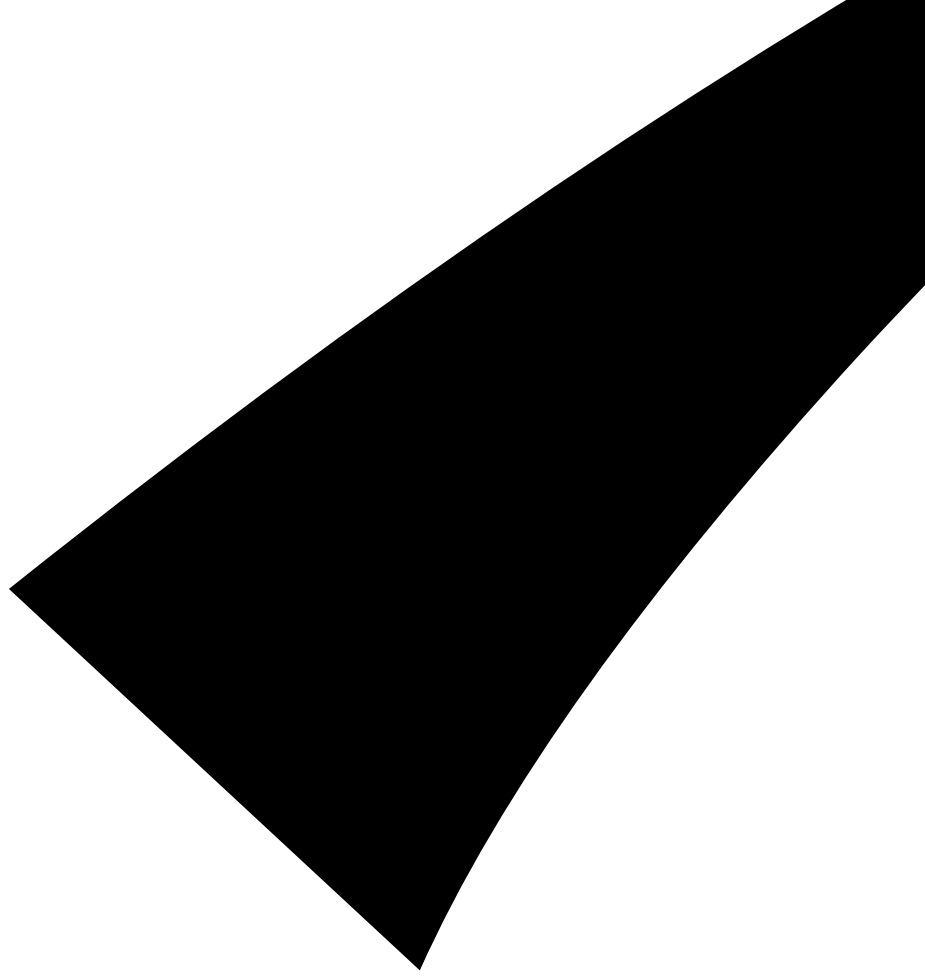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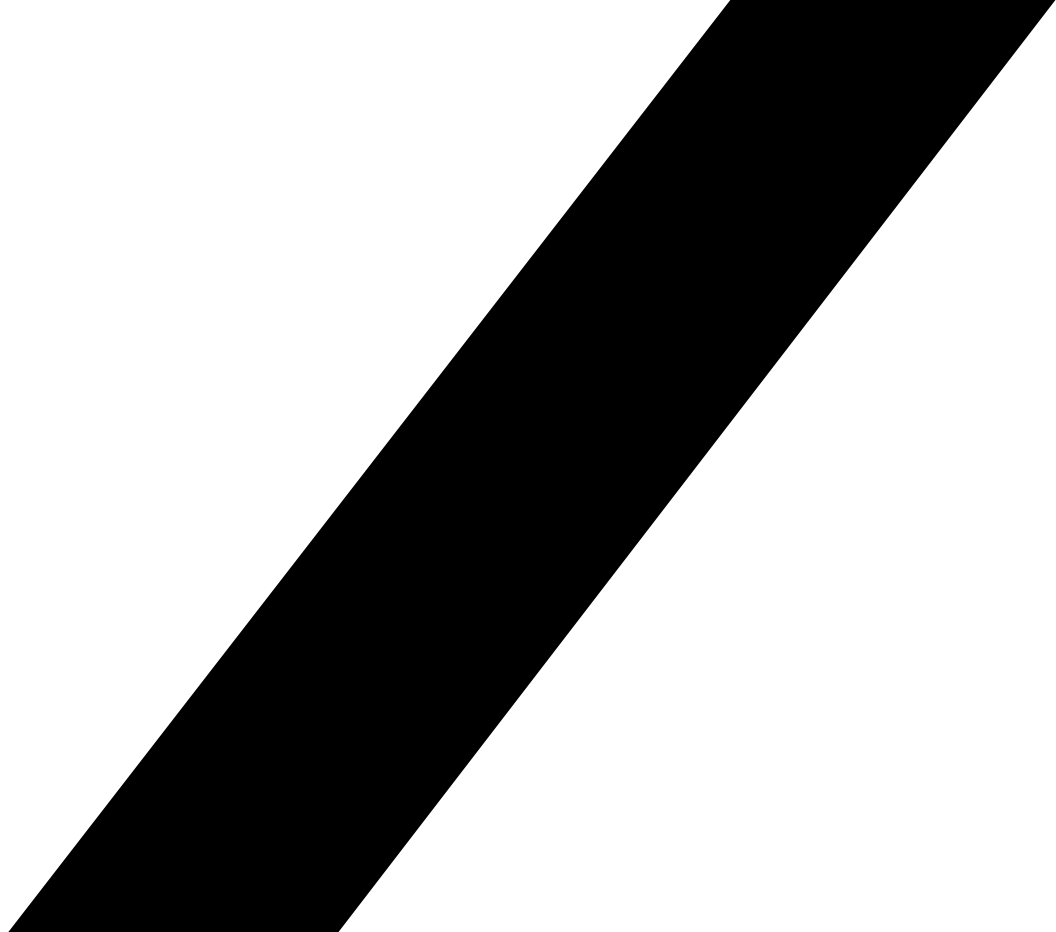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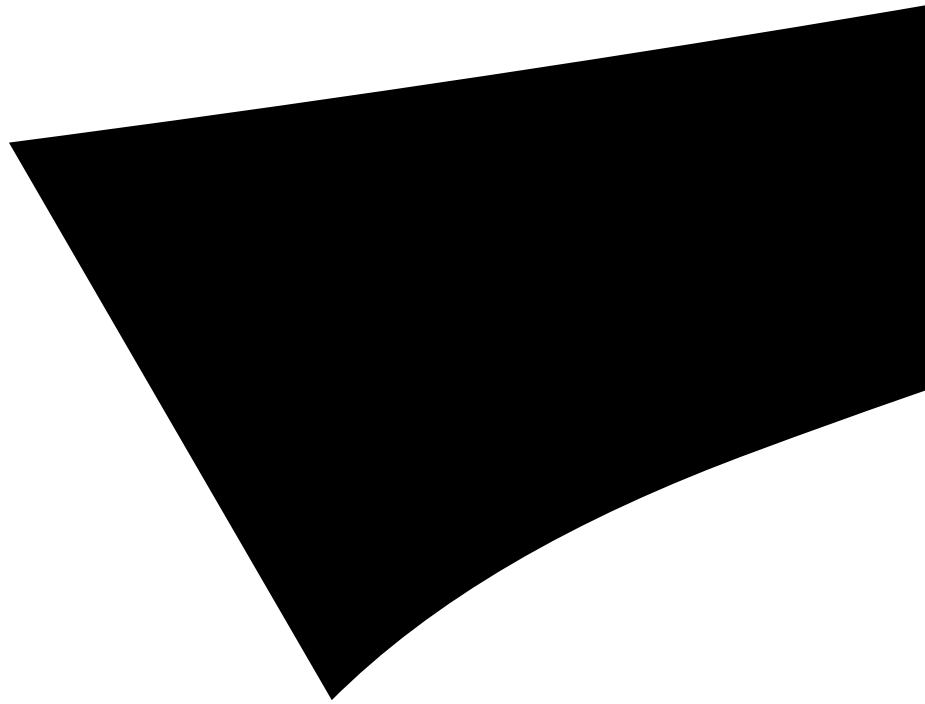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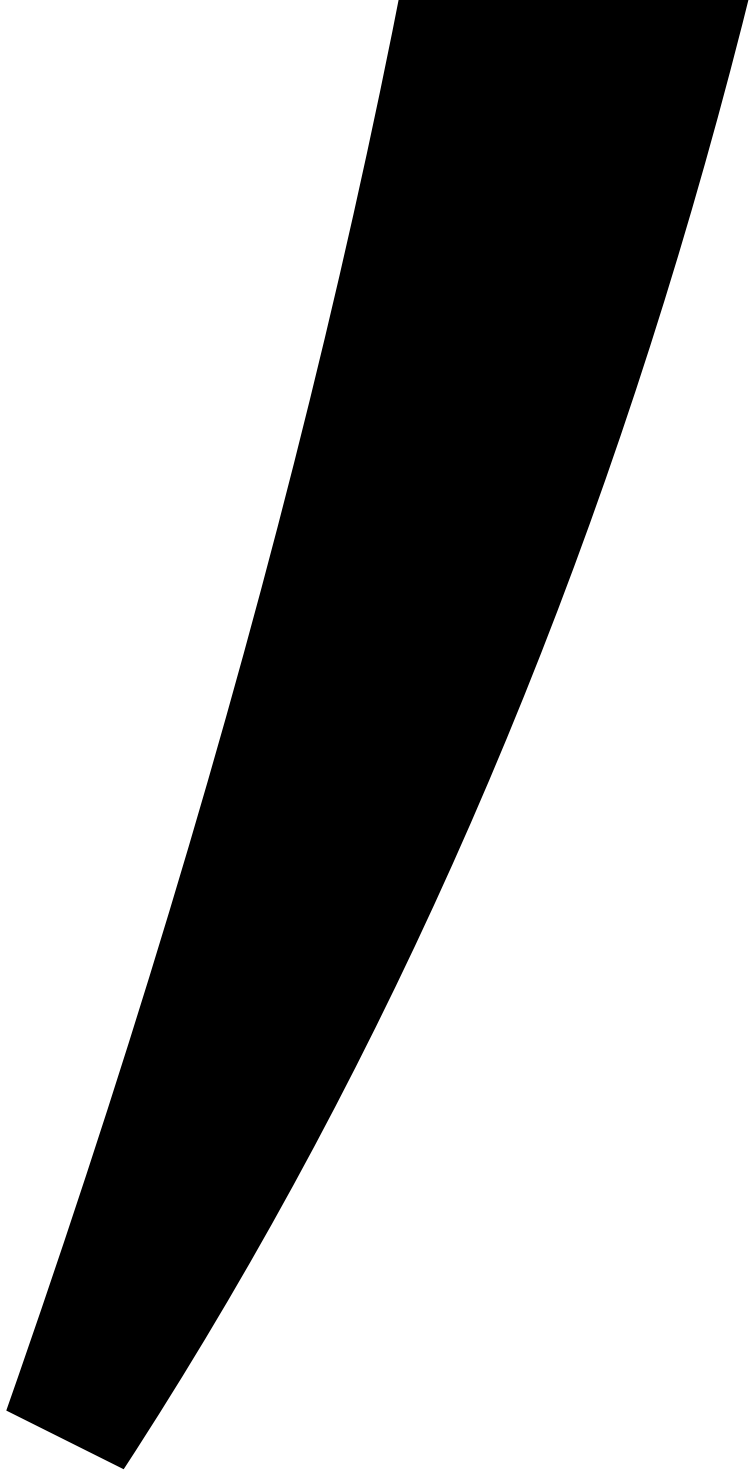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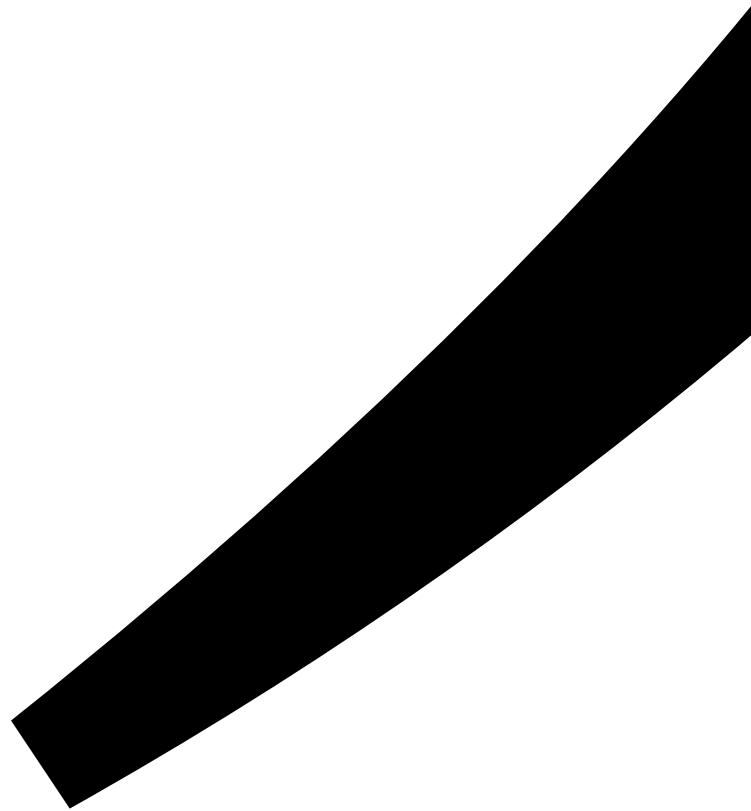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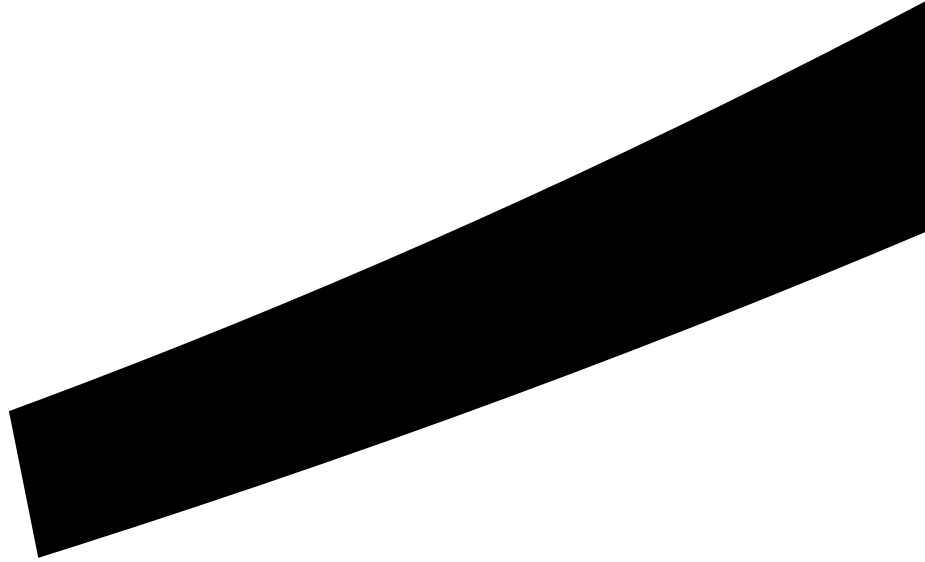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www.kci.go.k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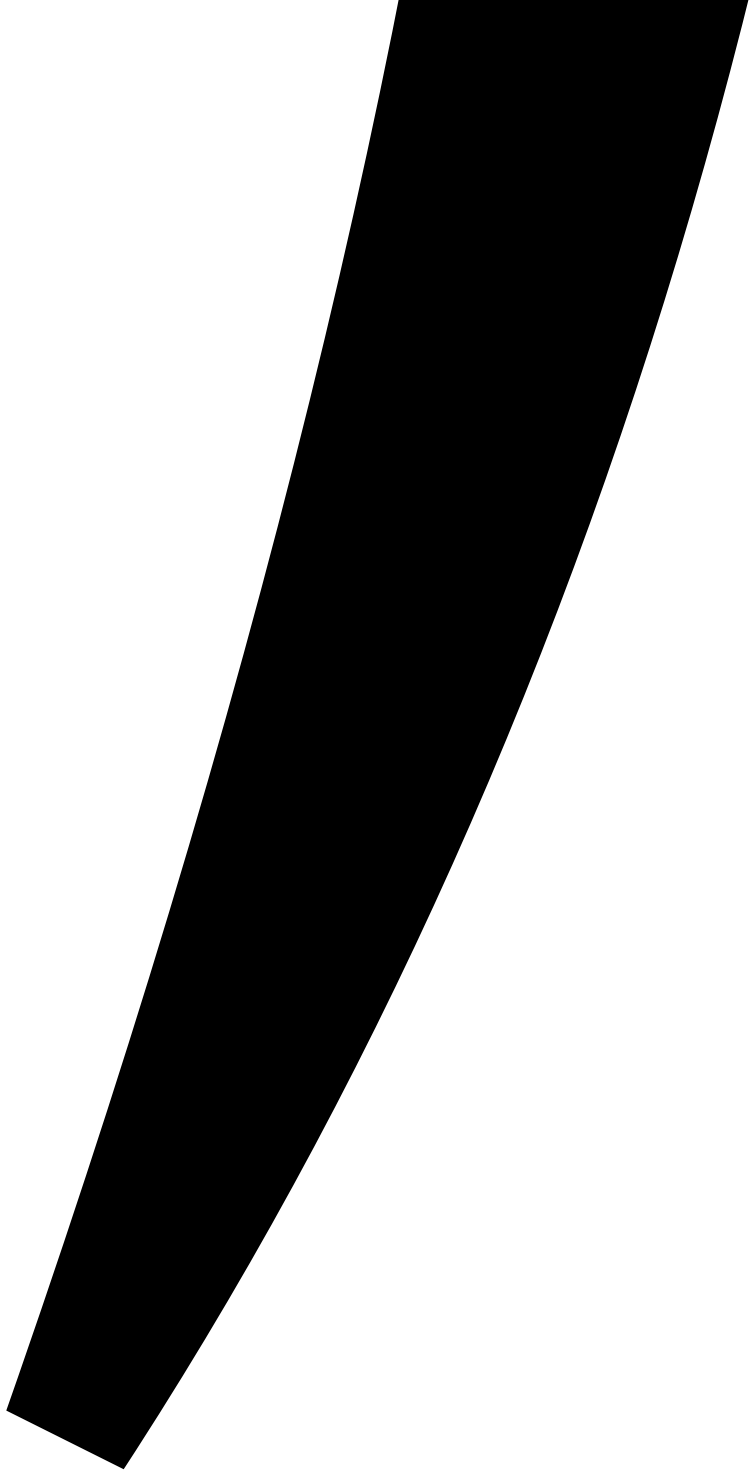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www.kci.go.kr

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人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予战斗，只得一同灭亡。”²³⁾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中国的个性解放运动不可能解决妇女的“经济独立权”问题，所以当时的个性解放不过是通过自由恋爱找到一个自己的心上人，或建立一个家庭，或同居。无论是启蒙者涓生还是受启蒙者子君都没有深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二人的新家说到底还是“男耕女织”的旧家庭模式。涓生的任务是如何赚钱养家，子君的职责是如何尽心持好家。作为新女性的子君从未考虑参与社会活动来获得独立的经济权，而是躲在家里考虑如何侍奉好丈夫，饲养好家禽，一个受了新式教育的时代女性不知不觉地飞回到生活的原点。关于这一点，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的人物吕纬甫有一段自我调侃的话来互涉，“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霍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费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是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个小圈子。”²⁴⁾ 社会没有给子君们获取独立的经济权创造条件，涓生们也没有在家庭里为她们创造条件，子君们也没有向社会和丈夫自觉地索取独立的经济权。子君们从旧家庭出发最后又回归到旧家庭模式里，虽然不是平面上画圈，但毕竟与愿望相差甚远，其实质性意义也应该大打折扣。这说明由男人引领的个性解放运动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开创意识比较稀薄和乏力。难怪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单提妇女的“经济权”问题不是没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涓生们也好，子君们也好，他们的因袭重负太重，传统与现代的因素相互交融在一起，恐怕前进中要有迂回，进步中要有退步，尤其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残酷现实里。这一现象在作者鲁迅身上也同样存在，他既包容了传统的妻子朱安，也接纳了新式女性许广平，不管有多大的客观原因所迫，毕竟都是鲁迅本人的选择。有时我们想：鲁迅为什么肯了呢？这没有用，假设是没有意义的。²⁶⁾

4.结语

25)

26)23)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624页
24) 《鲁迅全集〈在酒楼上〉》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第1573页

鲁迅在《伤逝》中演绎了中国的娜拉们走后怎样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他看问题总比他同时代的人看得尖锐、深刻，更注重现实性和时效性，但长于垫付，困于建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难免存在捉襟见肘的地方。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影响的，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诚，从海外贩来新知，沸腾了多少青年的热血，也最终形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巨大洪流，其中也包括鲁迅等人的功劳，在历史急剧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改变必然先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但处于变革过程中那些意识超前的人们首当其冲要受到冲击，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不妨把《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看成类似的先行者。鲁迅不是不明白有些牺牲的不可避免性，但她不像政治革命家关注牺牲的必要性问题，而是如何减少牺牲，把牺牲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其中尤其关怀社会的弱势群体，如《伤逝》中的子君，而不是涓生。鲁迅选择在女师大做《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其良苦用心是否在此。至于《伤逝》的涓生必须忏悔和自省，原因是你让人家醒来却无路可走。实际上，鲁迅是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基础上再一次用小说的形式深入启蒙那些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中国娜拉们。鲁迅在《伤逝》提出问题后便身体力行，他与许广平南下分头奋斗好为将来的新生活准备积蓄，直到1927年8月才结束天各一方的离散生活。鲁迅这样的大文豪尚且需要如此的勇气和付出，何况千千万万的涓生、子君？真可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诸君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鲁迅全集〈随想录四十〉》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
- 《鲁迅全集〈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 《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陈独秀在广东女屈联合会上的演讲稿，1921年。
- 《鲁迅全集〈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 《鲁迅全集〈娜拉走后怎样〉》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月第一版。
- 《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季羨林主编 2003年出版。

《永日集》 岳麓出版社 1988年版。
《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1922年。
《饮冰室合集》第三十九，中华书局出版，1936年版。
《鲁迅全集〈伤逝〉》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茅盾《追求》。
《鲁迅全集〈在酒楼上〉》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近年来〈伤逝〉研究综述》渝西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 第03期。
《谈鲁迅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8年 第06期。
《从女性视角看〈伤逝〉中的爱情悲剧》教育前沿·综合版 2008年 第07期。
《鲁迅〈伤逝〉思想的重新审视和界说》贵州社会科学 1996年 第06期。
《〈伤逝〉意蕴新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 第01期。
《论鲁迅的女性观》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 第06期。
《浅论鲁迅的妇女解放观》长治学院学报 2005年 第02期。
《〈伤逝〉爱情悲剧探源》绥化学院学报 1988年 第03期。
《论〈伤逝〉的反封建性》安徽文学 2008年 第06期。

梦醒了无路可走

——从《伤逝》看鲁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思考

洪永春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伤逝》中的主人公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作者鲁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思考：爱情模式、家庭模式和男女双方的主观不足。从而，让人们更清晰地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个性解放；爱情模式；家庭模式

Having no way out when you awake

From "Shangshi" to see Lu Xun's unique thinking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Hong Yongchun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love tragedy of Juan Sheng and Zi Jun who are the dramatis personae in "Shangshi", this paper reveals Lu Xun's deep thinking for the women's liberation during "May 4th" period: Love Style, Family Style and their subjective shdrtages. Thus, let people learn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more clearly.

Key words: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Love Style; Family Style.